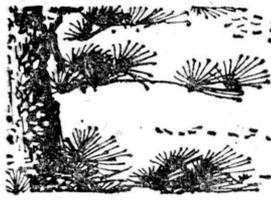


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到一九四五年九月日军无条件投降，在长达十四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周恩来同志担任过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共中央代表、国民政府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等多种职务。周恩来同志在统一战线工作中，积极与国民党政府上层人士竭诚交往，为争取抗战胜利做出了多方面的重大贡献。



# 同根华夏 共赴国难

——记抗战时期周恩来同志与国民党上层人士的交往

省社会科学院 张应超

的勾当。皖南事变发生后，于先生气愤地拍着桌子大声说：“这种破坏两党的合作，简直就是破坏抗战，我一定要讲话！”事实终于使他清楚地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为挽救民族危亡所做的种种努力。对周恩来同志与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于先生更是倍加赞誉，高度评价说：“周先生的人格真是伟大！”

## 张治中烈火辨知己

张治中先生在抗战期间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大本营管理部部长、湖南省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等职。他与周恩来同志早在黄埔军校共事时就有交谊。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他虽然避免参与反共战争，却对蒋介石的反动国策缺乏深刻的认识，采取了置身事外，“躲避两党斗争风雨”的作法。但是，长沙大火事件却使张治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二日，蒋介石以实行“焦土抗战”、“坚壁清野”为名，下令火烧长沙。当天深夜，长沙即被烧成一片火海。大火延续数日，全城房屋大部焚毁，居民被烧死者达二万余人，引起国内舆论的强烈不满。在此情况下，蒋介石为掩人耳目，逃脱罪责，把参与纵火的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备二团团长徐昆及公安局长文重浮三人作为替罪羊枪毙。张治中当时担任湖南省主席，也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国民党顽固派遂借长沙大火事件推波助澜，对张治中猛烈攻击。在他处境极端困难和危险的情况下，周恩来、叶剑英同志却给了他以热诚的帮助，替他解释苦衷，给他以安慰。张治中把自己草拟的预定在报上发表的谈话送给周恩来看时，周恩来还认真地为他斟酌字句，亲笔修改。张治中深受感动，认为这是他毕生难忘的一件事。后来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战，策划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张治中事前得到消息，即表示反对。事后，又向蒋介石上万言书，痛陈对中共问题处理失策，指出皖南事变“是招致两党破裂的开始”。以后，张治中还作了许多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有益的工作。

## 张淮南风雨结同舟

张冲先生字淮南，抗战时期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军事委员会顾问中将处长、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等职。周恩来同志是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才与他相识交往的。他与周恩来虽然身居两党，信仰不同，但为了抗战救国的神圣大业，抱着“无事不可谈通，无问题不可解决”的信念，终于促成了两党的接近与合作。一九三七年秋，张冲以赴苏实业考察团副团长的身份去苏联考察，在他离职期间，继任者推翻协议，给国共合作造成障碍。张冲回国后，一再设法补救，终未如愿。他还竭力为国共合作不辞辛劳地奔走，并在破坏国共合作的险风恶浪中坚持正义，力主团结抗日。一九四一年二月初，不断发生国民党军、警、宪、特拘捕殴打销售《新华日报》的报丁、报童和扣押《新华日报》的事件，二月六日一天，就有八个报

丁、报童被拘押殴打，下午，又扣押《新华日报》七大捆，诬其为汉奸报纸，当晚运至宪兵队。周恩来用电话通知张冲，随即赶赴现场，张冲亦很快赶到，对周恩来的安危表示关切，并陪同周恩来在严寒的深夜中工作了两个多小时。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一日，张冲先生不幸病逝。他在临终前与前去探望的周恩来同志谈话时，仍殷殷挂念着两党团结。周恩来同志对张冲先生也十分关怀，张冲患病时多次前去看望，逝后又沉痛地送了书题“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的挽联表示哀悼。同年十一月九日，周恩来又在《新华日报》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悼张淮南先生》一文，满怀深情地写道：“五年来，我与友党人士相识，无虑数百。惟因工作之关系，始终安危与共的，淮南先生实为其最”。

冯玉祥将军是中国近代革命史上的一位很有影响的人物，他参加过辛亥革命；讨伐过张勋复辟；驱逐溥仪出宫，欢迎孙中山先生北上；以后又积极参与第一次国共合作，誓师五原，参加北伐。在“九·一八”事变前二十年的戎马生涯中，虽然也有失误和曲折，但在当时的旧军人中仍不失为佼佼者。“九·一八”事变后，国事日非，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冯玉祥出于民族大义，于九月二十三日发出通电，谴责蒋介石穷兵黩武，媚外误国，实行不抵抗政策。一九三四年，冯玉祥与共产党再度合作，与吉鸿昌、方振武等人组织察绥抗日同盟军，并任总司令，与日寇浴血奋战，但终因蒋介石的包围、封锁、分化、瓦解而失败。事实终于使他认识到共产党的真诚与蒋介石的奸诈。他深为感慨地说：“我同共产党交朋友，没有吃过亏；同蒋介石拜把兄弟，可弄得我好惨！”后来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冯玉祥名为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第三、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实际上却没有实权，处处被掣肘。一次又一次的挫折和教训，使冯玉祥对共产党进行和领导的抗战愈来愈抱更大的希望。他派人到延安学习，指示在他支持创办起来的三户印刷所大量印刷《列宁全集》、《论持久战》等著作，在国统区发行。《新华日报》在武汉创刊时，他特地题词“大众喉舌”，进行支持和勉励。

芦沟桥事变爆发后不久，冯玉祥在武汉与周恩来同志有了密切的交往。他请周恩来派人参加他举办的讨论会，周恩来当即派吴奚如同志前往，又派李涛等同志给

## “我同共产党交朋友没有吃过亏！”

冯玉祥将军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大量宣传抗日救国文章，而且根据周恩来的要求，营救出当时在广西被捕的越南革命领袖胡志明及沈钧儒、张申府、华岗等知名爱国人士和共产党人，甚至卖字献金支援抗战。一九四〇年《新华日报》创刊两周年纪念时，冯玉祥又题词“精诚团结抗战到底”进行祝贺。国民党顽固派对冯玉祥将军与共产党紧密地站在一起坚决抗日救国的行动恨之入骨，诬蔑他是“伪君子”，骂他是“共产党的尾巴”，不仅限制、打击，还打算杀害他。但是，中国共产党却对冯玉祥将军的爱国行为给以很高的评价。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冯玉祥将军六十岁生日时，周恩来同志领导的《新华日报》特地辟出一个整版，在“庆祝焕章先生六十大寿”的通栏标题下，刊登各方面的贺电、贺词和寿文。由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董必武、叶剑英等同志都发了贺电，周恩来特地发表了《寿冯焕章六十大庆》一文，回顾了冯将军从参加辛亥革命起三十年来为献身于民族国家事业、奋斗不懈的丰功伟绩，盛誉为“抗战的中流砥柱”，希望他继续努力，“为民请命，为国效劳”，“坚持抗战成功，前途进步无量！”共产党对他的热诚相待，使他深为感动。十一月二十日，他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谢诗”明志，明确宣称：“……为了我们国家民族，为了全国同胞和全世界的人群，努力不懈，不怕牺牲，尽自己的本份打倒侵略的敌人。……”一九四二年七月，冯将军还打算去陕北，直接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事业。抗战胜利后，冯将军终于彻底与蒋介石决裂，与宋庆龄、李济深、何香凝等创建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宣布脱离蒋介石劫持下的反动中央。在时代的激流中，周恩来同志与冯将军密切合作，写下了为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的新篇章。

在一九三九年八月，周恩来同志就概括性地提出了统一战线的守则：“一、坚定的立场。二、谦诚的态度。三、学习的精神。四、勤勉的工作。五、刻苦的生活。六、高度的警觉性。”抗日战争期间，周恩来同志在与国民党政府上层人士的交往中，正确而有效地贯彻了这些原则。在坚持抗战的大旗下，为了争取和团结更多的力量，周恩来同志在作法上不拘泥于成例，能够因人而异。在统一战线中则通过各种途径，进行耐心而诚恳的团结和帮助，以共产党人大公无私的云水襟怀，谦逊可亲的友好态度，勤勉刻苦的工作去影响感

动他们，既不操之过急，亦不咄咄逼人。为他们更好地发挥作用创造条件，同时又注意不断巩固和加深同他们的友谊，帮助他们不断提高认识。周恩来同志努力而有效的工作，为党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分化和打击顽固力量”方针的正确贯彻，做出了光辉的榜样，同时也赢得了国内外许多有识之士的钦佩和尊敬。

## “我一切听周先生的！”

张学良将军在抗战初期曾任鄂豫皖“剿匪”副总司令、西北“剿匪”副总司令等职，一度支持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国策，曾与红军打过仗。后来，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他逐渐认识到只有联合中国共产党才能挽救危亡。在张学良与我党有了一些接触之后，周恩来同志于一九三六年四月九日在肤施（今延安）的一座教堂里，与张学良将军首次会见并彻夜长谈。周恩来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救国，不愿再纠缠旧账，并表示同意张学良逼蒋抗日的意见。周恩来的分析使张学良深为佩服，他兴奋地对周恩来说：“对！你们在外边逼，我们在里边劝，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蒋介石扭转过来。”张学良甚至慷慨地表示，自己还有一笔私人存款，必要时可以拿出来做抗日经费。在这次历史性的会见中，双方“共誓永不毁约”。事后，张学良常感慨地对部下说：“周恩来先生眼光远大，虚怀若谷，处处以民族利益为重。共产党真是了不起！”

西安事变发生后，以博古与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到西安处理善后事宜。当周恩来提出释放蒋介石时，不少人表示反对，张学良却在周恩来提出放蒋的第二天就明确表示：“我一切听周先生的，周先生说话，我放。”此后，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了，周恩来曾多次严正要求蒋介石释放他。同时，对张将军的爱国行动予以高度评价，称他为促成国共两党团结贡献最大的人。

“周先生的人格真是伟大！”

## “周先生的人格真是伟大！”

国民党元老、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先生富有民族气节，痛恨日寇的罪恶与汪精卫卖国的行径，但对国共两党的合作抗战，一度有些怀疑。然而，周恩来同志并未因此而疏远他。一九三八年，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长江局的领导下，《新华日报》在武汉创刊，特地请于先生书写了报头。于先生的女婿屈武同志从苏联回国后，周恩来又通过他多次去作于先生的工作，希望于先生在国民党内仗义执言，坚持两党合作抗战。这些工作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汪伪政权成立后，曾派“CC”系重要人物到重庆进行活动，图谋建立日、汪、蒋三方联系。周恩来得知后，立即请屈武转告于先生注意，于先生明确表示，决不能听任这些人去干出卖民族利益

本版插图 王凯新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

